

中國現代文字史

上 冊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 編著
文學史教研室現代文學組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
文学史教研室现代文学组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4年·北京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 編著
文学史教研室现代文学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鼓楼西大街琉璃厂28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71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内 部 交 流

*

書号:3022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張:11 $\frac{5}{8}$

字数:275,000 册数:4,001—8,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2版 1964年4月第3次印刷

統一書号:K10011·21

定价(4):1.20元

編 寫 說 明

本书最早是在1960年由我校新聞系1958年入学的全体同学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在党組織的领导下，发挥干劲集体編写的，参加指导的教师，有汪金丁、丁浦、林志浩、孟偉哉、侯君嵐等，余飄同志則领导一部分同学从事資料工作。同年10月以后，又由文学教研室教师林志浩、翁光宇、侯君嵐、王大敏、芦荻、刘瑞蓮、李永祜、钟賢培、柳影、高連第、周文柏、吳秋濱等，对原稿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很多章节是重新写过的；修改稿由何洛、汪金丁、馮其庸、林志浩負責审閱，并于1961年底、1962年初在校內出版。全書分上下两冊，共三十二章。1963年2月以后，文学史教研室現代文学組同志，又在原書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共分二十章，林志浩負責第一、二、三、七、八、九、十三、十五、十九章和第十一章中的第一、二、四、五节，王积賢負責第十、十四、十六、十七、二十章和第六章中的第四节、第十一章中的第三节，以及“胜利的大团結、大会师”，張慧珠負責第四、五、十八章和第六章中的第一、二、三节，第十二章中的第一、三节（該章的第二节为高連第負責）。緒論是由現代文学組集体討論，并由林志浩执笔撰写的。全書的审閱、加工和定稿工作，是由汪金丁、林志浩同志負責的。本書虽然經過許多同志的共同努力，經過多次的修改，并吸取了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中一些宝貴的东西，但由于我們的思想、业务水平所限，一定还有評述不当的地方。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和專家們指正，以便日后进行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語言文学系文学史教研室

緒 論

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它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在每一阶段的发展，除了本身的原因以外，主要取决于革命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文学与革命的政治的密切联系，文学服务于党在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光辉的战斗传统。

现代文学产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它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进步文学的一个合理的发展。通过五四运动，它才扩大了社会影响，并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已经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运动爆发后一个月，即到了6月3日，就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参加。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反映这个伟大的政治运动并为其服务的。当时的文学革命，是文化革命的重要一翼，它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話文；这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的文学革命。它反映了人民大众思想启蒙的要求，服务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社团相继出现，新文学和白話文逐渐

取得主要的以至于統治的地位。从“五四”开始，現代文学就是无产阶级領導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新文学运动也从此有了坚强的領導。1923—1924年，一些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坚持文艺战綫上的思想斗争，帮助作家認識文艺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使命，認識思想感情革命化的意义，对于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以及“五卅”前后反帝斗争的高漲，現代文学在这一期間有了新的发展，反帝主题的作品大量涌现，工农群众在斗争中显露創作才能，一部分革命作家参加实际斗争，并于1926年开始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单独领导革命。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一部分动摇、妥协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划清界限，一些革命作家便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鮮明主張，这就使“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发展成为从1928年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經過了論爭，轉到了原則問題的研究，同时也由于馬克思主义文艺理論的傳播，使革命作家团結起来，并在党的领导下，于1930年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革命作家不仅以自己的創作来反映现实斗争，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有一部分人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在反文化“圍剿”的战斗中献出鮮血和生命。魯迅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殘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① 这深刻地闡明了左翼文艺运动跟无产阶级政治、跟劳苦大众的血肉联系。在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由于党和毛泽

① 魯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頁。

东同志的直接领导，在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中尽了宣传鼓动的作用，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供了初步的宝贵经验。

抗战爆发前后，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步作家响应党的号召，为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1938年春天，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表明了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胜利。此后，大批进步作家下乡入伍，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通俗的、短小的抗战文艺作品大量涌现。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文艺运动便逐渐转向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文艺作品多以暴露国统区黑暗为内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由于有许多从上海、武汉等地奔来的文艺青年和作家的参加，更由于党的直接领导，而有了较大的发展。

综上所述，从“五四”到抗战前期的文艺运动，是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道路而向前发展的。它反映并参与了人民大众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但是无庸讳言，前二十年的文艺运动还处在摸索发展的阶段，当时由于反动政治势力的压迫，由于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也曾犯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其他一些错误。正像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路线和政策一样，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明确而完整的路线和政策的规定，也是由毛泽东同志来完成的。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深刻地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等重大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从而引起了现代文学运动的根本性的变化。《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的成熟，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进入了工农兵方向的新阶段。解放

区的文艺工作者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工农兵，进行思想改造和创作，使文艺自觉地、有力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讲话》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更伟大、更深刻的革命。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也受到了《讲话》的巨大影响，进步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斗争，“对于抗日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或配合的作用”^①。

“五四”以来三十年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它跟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具有血肉的联系，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两者的关系，概括地说来就是：现代文学运动是为革命运动所决定，同时它又反过来对革命运动发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的作用。

二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也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跟历史上一切进步文学都有极大的区别。它的阶级基础不是单一的，主要部分是无产阶级文学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此外还包括一部分要求反帝反封建但又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决定这种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也决定这种文学的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五四”时期和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间，无产阶级作家还

①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322页。

不多，還不成熟，無產階級文學還處於萌芽階段。當時無產階級在文學領域中的戰鬥任務，主要是由小資產階級革命作家來擔負，來完成的。魯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左聯成立以後，現代文學有了一個重大的發展。這一時期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學隊伍，無產階級文學已經不是處於萌芽的狀態，而是初步成長起來了。這是由於黨的領導和現實鬥爭的教育，有些作家已經從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發展成無產階級戰士，還有一些青年革命者和共產黨人參加到文藝戰線上來，初步組成了以無產階級作家為骨幹的左翼文學隊伍。魯迅後期的雜文和小說，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指導下的產物，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學的瑰寶。茅盾的《子夜》和一部分短篇，也屬於無產階級文學的範疇。其他一些革命作家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變革現實的要求，為我國成長中的無產階級文學貢獻了力量。此外，作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同盟軍而存在的，還有巴金、曹禺等作家的暴露封建家庭、黑暗社會的民主主義文學。抗戰前期，由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形成，無產階級文學隊伍的領導責任更加重了，它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中，貢獻並壯大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在黨所直接領導的地區，還有許多革命活動家和工农群眾用文藝創作來從事革命宣傳，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成長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不過，在左聯時期和抗戰前期，無產階級文學整個來說還不夠成熟。不少基本上屬於這一範疇的作品，還夾雜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情調，這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主觀原因的。

毛澤東同志於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但在於最明確最透辟地提出了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還在於根本上解決了如何為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從各方面探索了文藝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途徑……而把一切問題的中心放在文藝工作者同

工农群众結合、从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个根本問題上”^①。此后，由于认真地貫徹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許多作家取得了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取得了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也取得了創造无产阶级文艺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許多作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表現人民的民主革命要求，歌頌党的领导和农民翻身解放的斗争，同时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认清前进的道路，这就使这些作品的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强了。赵树理的小說，歌剧《白毛女》，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作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創作如《屈原》、《腐蚀》等，也力求以无产阶级观点来表現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就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來說，“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攏的”^②。

貫徹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取得的成就，在建国以前虽然还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它却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預示着我国的文学将要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学。

“五四”以后现代文学的主流，所以不是单一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革命的性质，既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农革命群众和他們的代表力求在文学上表現自己，反映他們的思想和要求；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則从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到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他們的立場、世界观和創作方法，又須要經過一定时期的鍛炼和发展。这就决定现代文学的主流，包括无产阶级文学从萌芽到成长壯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小资产

① 周揚：《我們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5—16頁。

②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322頁。

階級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从开始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到逐漸轉變其自身的性质同无产阶级文学合而为一，它們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最終要发展成社会主义的文学。

三

文艺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經濟在觀念形态上的反映，社会政治、經濟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文艺上来。一部现代文学史，从斗争方面說，也是一部反击和战胜各种反动的文艺派別和思想的历史。

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首先要同敌对阶级的封建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学交鋒。“五四”新文学就是在同以文言为形式的封建文学的斗争中产生的，接着又粉碎了《学衡》和《甲寅》等封建文化派別的进攻。以后封建文学虽被盖棺論定，但仍时有“殘渣的泛起”，因而也时有小規模的斗争。从三十年代起，革命文学还先后对国民党御用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战国策派”和所謂“戡乱文艺”等进行斗争。反动派和他們的走狗，虽然文武兼施，誣蔑和迫害并重，但始終挽救不了他們失敗和死亡的命运。

在现代文学史上貫串始終而且表現得最尖銳、最突出的斗争，則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由于封建阶级的极端腐朽，他們的意識代表在“五四”时期以后就已經沒落了，所以反动統治者不能不重新物色人选。从资产阶级方面說，他們的意識代表不但和封建主义保持着千絲万縷的联系，而且接受西方沒落期的意識形态，又穿上“五四”的“新衣”，这正是反动統治者所需要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五四”以后的民主革命，已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而资产阶级即

使在一定时期能够参加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文学即使是新文学統一戰綫的一个組成部分，但它的階級本性却是同无产階級針鋒相对的，它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是要跟无产階級爭奪領導权的，而且害怕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进行，更反对走向社会主义。特别是資產階級右翼更是如此。因此反映在文艺戰綫上，无产階級与資產階級两种思想的斗争就显得特別剧烈，并成为現代文学史上的主要矛盾和斗争。

这个斗争的表现形式是十分复杂的，它在“五四”时期表现为統一戰綫内部的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的分歧，“問題与主义”的論爭，其实质正是无产階級的彻底革命論与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之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胡适等資產階級右翼就逐漸从統一戰綫中分化出去，先后組織“新月派”、“現代評論派”，并墮落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喉舌和爪牙。他們公开維護資產階級剝削人的“文明”，最早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文艺思想，于是斗争就表现为敌对的形式。当敌人公开的进攻被击潰以后，他們又在“‘左’或灰色遮掩下”发动进攻。标榜超階級、反对政治干涉文艺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就屬於这一类。以后斗争还发展到革命文艺队伍内部，資產階級文艺思想則采取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現。当毛泽东同志的《講話》在文艺界产生深远影响，在对敌斗争中發揮强大威力时，斗争的焦点就常常集中在貫徹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上，这就是革命文艺界同胡风集团和一些反党分子所进行的斗争。《講話》的根本精神是深入群众，改造思想，使文艺和群众密切結合；胡风則用加强“主观”来反对思想改造，用“到处都是生活”来反对深入群众，同群众結合。党和人民要求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歌頌解放区的光明和人民的英雄气概；王实味、肖軍、丁玲等則要用文艺来暴露解放区的“黑暗”，瓦解人民的斗志。所以斗争是不可調和的。

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始终围绕着文艺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問題。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总是否定文艺的阶级性，宣扬“为艺术而艺术”。他们诬蔑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会妨害艺术的真实性，要求文艺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自由”。梁实秋、苏汶等，都是唱着这个调调。贯彻与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斗争，也是文艺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斗争。反对文艺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文艺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实际上是要使文艺服务于反革命的政治，使文艺与反动派相结合，成为他们进攻人民的工具。长期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尽管有时表现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有时表现在那个具体问题上，但归根到底都离不开这个文艺路线上的根本问题。

现代文学的发展史清楚地表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政治气候的寒暑表，它跟社会政治存在着深刻的多方面的联系。而且，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常常不只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创作方面的；不只表现在文艺思想上，也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上。随着革命的深入，“五四”新文学统一战线分化了，左联以后的革命文学队伍也不断发生分化，一分为二，斗争是绝对的，步步深入的：从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从白话与文言之争到文学有无阶级性、作家能不能超阶级，再到要不要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党的文艺路线。此外，我们还看到：文艺思想斗争可以扫除障碍，解放文艺生产力，促进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而总结和认识这些规律，则有利于我们警惕和坚持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四

中国现代文学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它应该带有我

們民族的特点，應該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和要求，并逐漸成為他們自己的文學。“五四”以來的文學創作，在內容、形式的民族化、群眾化方面，隨著黨的領導的加強和革命運動的深入，而有顯著的變化和進展。

“五四”文學革命，反映了人民大眾思想啟蒙的要求，而白話形式的提倡，則促使文學和人民大眾的關係接近了一大步。當時為了適應新的戰鬥要求，曾廣泛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文學的影響，這極大地幫助了植根於民族土壤的新文學的生長。它一產生在內容上就不僅以反封建的徹底性，還以表現下層人民的生活，特別是探索被壓迫農民的革命力量和要求，而顯示了它跟舊民主主義文學的顯著區別。魯迅的小說所以成為現代文學的基石，就在於它充分地反映人民革命的要求，反映農民在接受無產階級領導以前的痛苦和期待，而在藝術上則勇于吸收外來的影響而又葆有鮮明的民族風格。郭沫若等早期作家，雖然接受外來的影響十分明顯，但他們對於古典文學的修養，對於民族的生活、心理、語言的熟悉，也賦予他們的作品以一定的民族特色。不過，就“五四”時期及此後幾年間新文學的整體來看，民族化、群眾化的問題尚未被充分地認識，不少人使用的還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他們過多地否定民族的文學傳統，無批判地接受外來的事物，有些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又由於當時的作家主要屬於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大多數人跟工农群眾在生活 and 思想上都有很大的距離，不能夠也不善於描寫他們。這些作家雖然也批判舊社會、舊禮教，但多從認識青年的切身要求出發，未能從工农群眾的角度來提出問題；或者雖然描寫了下層人民，但也只限於人道主義的同情，缺乏對人民的精神面貌作真切、有力的反映。這一切都影響到作品的生活內容、表現手法、語言形式

等，缺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所以，创作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就不能不成为新文学进一步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要求文艺作品把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来加以描写，并尽快地克服它在相当程度上脱离群众的倾向。左联曾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提倡文艺大众化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试作各种通俗性的文艺作品，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此外，在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学，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尚有个别偏差，但总的说来还是克服了“五四”时期形式主义地吸收的缺点，有力地促进了以文艺大众化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在创作上，茅盾的《子夜》、《农村三部曲》，殷夫的红色鼓动诗，蒋光慈、叶紫等作家的一部分作品，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但基本上表达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作家还只能描写学徒、苦力、手工业者和被压迫农民，那么这一时期的作家便不只描写这些，而是开始写出具有强烈时代色彩和革命斗志的产业工人，以及在斗争中成长的劳动农民了。过去那种人道主义式的怜悯也逐渐减少了，而代之以愤怒的控诉和战斗的呼声。在其他题材的作品里，思想内容的群众性、战斗性，也有某些可喜的变化。此外，由于作家对民族生活、风习、语言的进一步熟悉，而使左联时期的文学在民族化方面也有若干进展。

但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整个面貌仍然十分复杂，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跟人民对文学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由于反动的政治环境的压迫以及主观认识的不足，作家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仍有隔阂，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学的群众化被简单地看做只是语言形式的通俗化问题；文学的民族化问题还没有被自觉地提上工作日程。这

就使有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仍然带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弱点，“衣服是工农兵，面孔是小资产阶级”的现象相当普遍，欧化的现象也未得到很好的克服。至于一般的民主主义作家，虽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多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未能站在三十年代新的高度去反映现实的发展，对作品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也缺乏应有的重视。

抗战爆发后，由于作家下乡入伍，接近群众，接近战斗生活，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曾一度有过良好的进展，但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作家的限制和压迫，国统区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又不免要经历一番曲折。1938年10月以后，毛泽东同志曾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对文化、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中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和英明的指示，这就使整个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他又针对过去文艺运动的根本弱点，最正确地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②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曾引起进步文艺界的热烈讨论和重视，并在解放区得到了贯彻，这就使解放区文学产生了伟大的变革。工农群众及其英雄人物以历史创造者，也是作品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创作里，“衣服是工农兵，面孔是小资产阶级”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作品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开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523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同上书第3卷，第852页。

始做到民族化、群众化。小說、詩歌、歌劇在学习民間文艺、运用民間形式而加以革新創造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沒有排斥对于古典的和外国的文学遺產的借鉴。赵树理的小說,《白毛女》和《王貴与李香香》等作品,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此外,改造民間文艺和艺人,开展工农兵群众文艺,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对于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解放区文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对于国統区文艺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許多优秀的作品,“在风格上一致地表現着一种新的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①。

列宁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須結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它必須在群众中間喚起艺术家,并使他們得到发展。”^②文艺的群众化乃是文艺和群众相結合,是文艺創作发展的根本方向問題,离开了群众化的軌道,就不可能完成文学的战斗任务。而文学的民族化則又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成熟的标志,也是它是否能为群众喜聞乐見的重要条件。离开了民族化,群众化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离开了群众化,則民族化也将失去了方向。所以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我們的文学将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底层,充分反映他們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同时,批判地继承民族文艺傳統而加以革新創造,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文学的有益东西而使之民族化,这就是我国現代文学发展的最寬广的道路。

①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載《中国現代文学史參考資料》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326頁。

② 蔡特金:《列宁回忆录》,載《列宁論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912頁。